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俄乌冲突百日思：世界向何处去？

——来自中国学者的观察

作者

陈东晓 达巍 崔洪建
赵隆 吴莼思 余翔



2022年6月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俄乌冲突百日思：世界向何处去？

——来自中国学者的观察

陈东晓 达 巍 崔洪建

赵 隆 吴菀思 余 翔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国际传播中心 出品

2022年6月

写在前面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在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一百多天来，这场冲突在全球引起了极为强烈而持久的关注。在这罕见的舆论热潮中，我们看到全世界都十分关心中国是如何看待这场冲突的。坦率地说，有些国家对中国的观点还有不少疑虑。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人们对这场冲突的看法也大相径庭。社交媒体上你来我往，彼此都很难说服对方。

您现在读到的这份报告，是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携手打造的成果。我们试图从国际秩序、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俄关系、军备控制以及国际经济的视角，研判俄乌冲突的根源、冲击与影响。作为京沪两地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专业智库，我们希望为国内相关讨论增添一份理性平和的声音，也力图为中国之外的读者提供一种有代表性的中国声音。

或许您在读完报告后会发现，学者们对这场冲突的影响评估总体上是严峻的。同时，我们当然也在努力寻找出路，提出对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挑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局的时代。紧紧盯住天边飘来的乌云，同时不放弃对乌云金边的期许和努力，这是我们作为智库学者的本职与本分。

陳東曉

述藝

作者简介



陈东晓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达巍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崔洪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赵隆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所研究员



吴苑思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



余翔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

目 录

达 巍：跨越国际秩序的卢比孔河	1
陈东晓：俄乌冲突对中美关系带来严重影响	6
崔洪建：中欧能否共克时艰增进合作?	13
赵 隆：俄乌冲突不会改变中俄关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独立价值	17
吴菀思：俄乌冲突对国际核军控和裁军的影响	23
余 翔：俄乌冲突加快国际经济秩序调整进程	28

跨越国际秩序的卢比孔河

达巍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在乌克兰东部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方面的军事进展显然并不顺利。在西方支持下，乌克兰的抵抗异常顽强。目前，战事已逾百日，交战双方仍处于攻守胶着状态。战争将持续多长时间？是否有一方将被彻底击败？冲突是否会扩大？人类是否将面临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是一场核战争？有关这场冲突的疑问可以列出一长串，多数目前无人能够回答。不过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俄罗斯军队2月24日跨越的，不仅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陆地边界，而且更是冷战后国际秩序的卢比孔河。^①

旧秩序明面与暗面

在开始论述之前，让我们先来明确一下我们讨论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国际秩序是关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边界的一套安排。当各国都知道他们在国际体系中能做什么，不能作什么，做什么收益比较大，做什么代价比较大，并且也都自愿或者被迫接受这套规则时，我们就说世界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国际秩序。在当代，国际秩序基本上是由国际法、国际规则、国际规范以及霸权国家的某些蛮横行为来界定的。与国际规则密切相关的另外一个概念是国际格局。这是指大国力量的对比及其相互关系。换句话说，主要大国谁强谁弱，谁是谁的朋友，谁是谁的敌人。国际格局是决定国际规则的主要变量之一。

冷战结束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国际秩序，地球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被这一秩序所笼罩。无论我们喜欢还是憎恨这套秩序，事实是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意识形态为根基，以全球化为推进器，以联合国体系以及

^①公元前49年，统领高卢的罗马执政官尤里乌斯·凯撒奉元老院召唤返回罗马。按照罗马法律规定，任何返回罗马的执政官都不得带领军队跨越罗马以北的卢比孔河，否则将被视为叛国。1月10日，凯撒率领第13军团横跨卢比孔河，罗马内战爆发。凯撒的政敌庞培和部分元老院议员仓皇逃跑。罗马从共和国时代进入了帝国时代。

国际法为基本裁决者，但有时又以美国的军事霸权和美元霸权作为“世界警察”的一套秩序。美国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这是支撑冷战后国际秩序的格局基础。

对很多国家来说，这套秩序有其好处。在人类历史上，这套秩序可能是相对而言最和平、最开放、也最讲规则的秩序。国家边界被弱化，资本、技术、人员和信息在全世界空前自由地流动。美国在这套秩序中始终居于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不仅经济和科技在全球领先，而且在外交和军事上常常为所欲为，很少有国家能够或者愿意出面节制美国的行为。中国的经济在这套秩序中迅速发展，在 40 年时间里，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当然，对很多国家来说，这套秩序也有其阴暗面。西方发达国家面临两重问题。其一，由于国家和政府的力量被弱化，资本在全球范围流动，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贫富差距和阶层矛盾。在过去 500 年中，国家边界似乎第一次不再是全球范围内财富分配的首要依据，阶级和阶层取而代之成了最重要的标准。过去，一个新生儿未来的经济地位很可能是由他/她是哪个国家的公民来决定的；而今天，最重要的因素是他/她的父母是谁。其二，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快速崛起，这一趋势如果持续下去，西方国家几百年来霸权地位有可能会被动摇。而且这些崛起国家的国内制度与西方国家有相当大的差异，这让西方国家深感焦虑和不安。

对于中国和俄罗斯这些国家而言，这一秩序的主要问题也有两重。其一，这套秩序所标榜的自由主义原则不仅存在于国家之间，不仅仅意味着自由贸易、国际法治。西方国家认为，这套原则也必须渗透于所有国家的政治生活内部。中国和俄罗斯等国被美国和西方国家视为“非自由主义”国家，不仅不被信任，不被视为国际秩序的合格建设者，而且其政治安全还一直面临严重威胁。其二，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的霸权主义让很多非西方国家都很不舒服。例如美国不断推动北约东扩，强化亚太盟友体系，任意在中东使用武力，造成了远比今日乌克兰更严重的人员伤亡。俄罗斯突然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行动，也可以看成是其对美国长期不满的一次总爆发。

卢比孔河是如何被跨越的

俄乌战争并不是冷战后国际秩序遭受的唯一一次重大打击。换言之，卢比孔河并不是一步就能跨过去的。最早跨越卢比孔河的，也并不是俄罗斯或者普京。事实上，过去6年间，这一秩序每两年就遭受一次重击。

2016年，英国民众通过公投决定脱离欧盟，美国选民则选择了唐纳德·特朗普为美国总统。这一信号再清晰不过：冷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建设者和维护者选择对过去四十年盛行的新自由主义转过身去。英国人要重新筑起欧盟拆掉的国家边界；而打着“美国第一”旗号入主白宫的特朗普则是一个超级“筑墙者”。这些墙，包括实体的美墨边境墙，也包括国家之间的贸易之墙，美国内部的种族之墙以及不同社会之间的心理之墙。

2018年，特朗普政府启动了对中国的贸易战和科技战。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曾经被学者称为“中美国”的两个国家，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对抗和脱钩进程。两国关系开始自由落体般地下坠，两国民众对对方的好感度下滑到历史最低点。在亚欧大陆的东侧，地缘政治的巨大鸿沟让其他不愿选边站队的国家陷入两难境地。

2020年，冷战后的国际秩序遭受到第三次重大打击。新冠肺炎疫情最早在中国被报告，很快席卷全世界。大流行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世界各国都被迫关上相互交往的大门。对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恐怕是他们一生中第一次遭遇整个世界都停顿下来的局面。以“开放”为主要特征的冷战后国际秩序一度走向了完全的封闭。

经过以上几次打击之后，无论是美国、中美关系还是全球人员往来都已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以非常惨烈的方式给旧的国际秩序以第四次重大打击。我们正在目击二战结束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地面冲突。虽然现在还很难对战争最后的结局做出预测，但是俄罗斯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已经无可挽回地破裂。欧亚大陆西侧的地缘政治板块正在发生巨大而深刻的断裂。欧洲向西漂去，跨大西洋关系益愈紧密。曾经被法国总统马克龙描述为“脑死亡”的北约重新复活，并且可能会迎来新的成员。俄罗斯不可避免地向东和向南漂去，中国、印度、南非等国在联合国大会谴责俄罗斯“入侵”的决议中投下了弃权票。

我们如何掷骰子

俄乌战争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世界是否正在走向两个阵营的对立。其中一个阵营是美国领导的西方国家，另一个阵营则是中国、俄罗斯和其他一些中小国家。如果俄乌战争后国际格局真的演变成了两个阵营，那意味着人类将进入第二次冷战。就像二战与一战有很大的差别一样，第二次冷战当然也与第一次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双方

还能保持相当多的交往，但是归根到底，相比于我们曾经拥有的开放与合作，两个国家集团以非战争的形式激烈对抗绝非任何国家的福音。

由于俄罗斯基本上已经被锁死在与西方敌对的位置上，世界是否将走向两个阵营以及新的冷战，主要取决于美国、欧洲和中国的选择。俄乌战争爆发后，美国将欧洲盟友更加紧密地拉到身边，共同对俄罗斯采取强硬政策。在对中国的态度上，美国很多人试图将中国的形象“俄罗斯化”，不断通过无法证实的“情报”来把中国与俄罗斯捆绑在一起。美国官员反复宣称中国在战争之前可能知情，在战争爆发之后将给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等。通过这种毫无根据也毫无成本的放话，美国正在推动两个阵营的形成。看起来这与美国政府的战略意图是符合的。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民主、共和两届政府都拥有一种摩尼教式的世界观，将世界描绘成“民主”与“专制”的对抗，并将美国描绘成前一阵营的领导，而中俄是后一类国家的代表。但是美国决策者也需要考虑，将中俄同时推到敌人的位置，将导致自己严重的战略透支；将原本紧密连接的世界撕裂成两个阵营，对美国自身的利益也将造成巨大损害。利用美元地位制裁别国，实际上在损害美元作为国际贸易和储备货币的地位。此外，从中长期看，美国国内政治方向的不确定性也将给其对外战略带来很大变数。

欧洲仍处于战争的“创伤应激反应”阶段，除了与美国站在一起援助乌克兰、试图击败俄罗斯外，似乎腾挪的空间非常有限。但是从中长期看，世界变成两个阵营，并不符合欧洲利益。一是欧洲的“战略自主”将无从谈起；二是与中美之间存在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不同，中欧之间并没有地缘政治问题，欧洲并没有必要与与中国激烈对抗；三是俄罗斯毕竟是欧洲搬不走的邻居。欧俄关系的长期紧张，对欧洲并没有好处。从中长期看，欧洲国家是决定格局的关键变量：欧洲是在中美俄之外真正实现其“战略自主”，还是被战争的冲击波锁定在新的二元对抗格局当中，需要欧洲领导人作出明智的选择。

中国的选择则可能是最重要的。过去40年，中国是通过与世界相互连接而不是相互脱离实现发展和崛起的。中国当然没有动机和理由去切断这种相互连接。然而，过去几年美国对中国持续打压，激起了中国国内各个阶层广泛的义愤。如果中国被这样的情绪牵着鼻子走，那么凡是不利于美国的，中国就应该去做。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将是加快与西方国家脱钩，最终可能将对中国的民族复兴事业造成巨大伤害。因此，在未来的道路上，中国只能以是否有利于自己的发展和复兴作为唯一的战略标尺。对

于欧洲和中国来说，国际秩序并非只存在卢比孔河的南岸和北岸这两个选项。欧洲当然会长期保持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中国与俄罗斯也是最重要的邻国和伙伴，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欧俄就非要形成截然对立的楚河汉界不可。

2000多年前当凯撒率领大军跨过卢比孔河时，这位罗马帝国的伟大奠基者留下了一句名言：“*alea iacta est*”（骰子已经掷下）。人类历史的进程有时候的确像一枚转动的骰子，我们无法预知它什么时候会停下来，并且最终呈现怎样的面相。但是人类历史又并非完全是宿命和不可知的。决策者在给定的历史时空条件下做出决定，这些决定在彼此碰撞后将构成历史，因此人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凯撒之后2000多年，伟大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说，“上帝从不掷骰子”。是的，卢比孔河已经跨过，但是大国及其领导者仍有责任谨慎地选择向前的每一步。

俄乌冲突对中美关系带来严重影响

陈东晓

早在俄罗斯2022年2月24日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前的一年间，中美关系的互动模式已经发生了“范式转移”——华盛顿普遍认为中美关系进入战略博弈的“持久战”：拜登政府总体接过了特朗普政府对华遏制的衣钵，区别在于前者比后者更重视如何塑造有利于“遏制中国”的国际环境，同时至少口头上更强调要为防止战略竞争脱轨设置“护栏”。与此相对应，北京也日益相信中美关系已经进入战略博弈的相持期。中方颇为主流的叙事是，中美博弈反映了两国的权势、制度以及观念之争，将贯穿中华民族复兴的全过程。外界一般认为，竞争和斗争已经成为华盛顿和北京在处理双边关系的核心词汇。

当然，实际情况似乎更为微妙。一方面，与两国的官员不时爆发的嘴仗不同，双方领导人在有限的对话中仍然强调要为中美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留出合作空间，并且也各自表达了不让中美关系滑入“新冷战”的意愿。另一方面，2022年中方正全力准备中国共产党二十大召开，美方也面临中期选举这个更为紧迫的政治议程。无论从各自稳定经济的国内需求考量，还是两国政策团队虽不热络但比特朗普时期更可预期的互动方式而言，人们对稳定中美关系有了更高的期待。对此中方显然比美方更见行动。今年年初，北京高调纪念中美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不断呼吁华盛顿重拾“求大同、存大异”的“上海公报精神”来照亮中美关系的前进之路。

然而，俄乌危机的急剧升级并引爆俄罗斯对乌全境的直接军事进攻，不仅让北京措手不及，而且持久的战事以及可能的进一步大规模升级的危险，无疑给本已经非常困难和脆弱的双边关系又压上了块巨石，显著增加了北京处理中美关系的难度。

三重困境

首先，俄乌危机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中美两国的相互怀疑和敌意。一方面，华盛顿和北京围绕俄乌冲突的起源及责任归咎存在深刻的分歧，其实质是双方对当前国际秩序的性质及未来发展愿景的重大差异。华盛顿谴责莫斯科对乌“发动侵略战争”，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指责中方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

北京则强调俄乌危机不仅历史经纬复杂，而且后冷战以来北约不断东扩而无视俄罗斯合理安全关切，是导致当前俄乌冲突的重要原因，美西方自身难辞其咎。随着美方大力军事援助乌克兰，通过了高达400亿美元援乌法案，并对俄实施空前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拜登政府高官及美国会两党领袖也纷纷表示要借此全面“削弱俄罗斯”。中方则据此指出，美国和北约正与俄罗斯进行一场“代理人战争”，美国真正的战略目标就是通过乌克兰战争的长期化来“拖垮俄罗斯”。加之白宫高级官员也一再重申，俄乌冲突不改变美国关于“中国是美国最主要战略对手”的判断，在北京看来，美西方希望通过这场战争，企图恢复其已经弱化的国际秩序主导力，扭转北京经常提及的“东升西降”的全球力量发展轨迹。

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后美方加紧炒作“中俄轴心论”也日益增添北京对华盛顿的战略警惕和对立。在北京看来，华盛顿和北约领导人断章取义理解2022年2月4日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中“中俄合作无禁区”等词句，目的是妄图坐实中方是俄发动战争的“从犯”罪名。美西方向俄罗斯发动大规模经济金融制裁后，华盛顿还威胁中方不能帮助俄罗斯脱困，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美参众两院通过所谓《轴心法案》，要求美国务院定期向国会提交关于中俄合作及中国助俄逃避美西方对俄制裁的报告。北京则批驳美方是“贼喊捉贼”，认为美方不仅意在借乌克兰危机发战争财，而且企图用“民主对抗独裁”的话术，在国际上组织反对中俄的联合阵营。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在欧洲和亚太地区明显加快了以中俄为假想敌的军事同盟协作。北京指出美国领导的北约有“亚太化”甚至“全球化”趋势，反映了美方进一步对中俄实施“双遏制”、推动新冷战的战略意图。

中美两国政府因俄乌冲突升级的战略敌视，也进一步影响了两国民意对立情绪。根据美国皮尤民调机构今年4月28日的调查，超九成受访美国人认为中俄之间的伙伴关系是“严重问题”，同时受访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再创新高”——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受访美国人占82%。俄乌冲突也引发中国民众广泛关注，尽管民间对俄乌冲突的原因及影响有不同观点，但随着战事的持续升级，中国民众大都认为俄乌冲突已经演变成为一场西方针对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而且美国和北约的真实目的是企图同时削弱中俄两国。

其次，俄乌冲突进一步恶化了中美各自总体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安全，更加速了双方科技及关键产业链的分离程度。一方面，俄乌冲突，叠加疫情复苏分化和通胀高企，

加剧了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给本已脆弱和失衡的疫后世界经济形势雪上加霜，作为世界经济主引擎的中美两大经济体受到严重影响。大宗商品价格轮番上涨使得美联储在遏制高通胀和防止经济衰退的政策选项之间左右为难。不少国际经济分析机构发出了美国出现滞胀甚至再次陷入经济危机的预警。对中国经济而言，俄乌战火的蔓延以及美西方国家对俄空前规模的制裁和连带制裁，直接阻断了中方与乌克兰的投资和经贸往来，限制了中国与俄罗斯战前正常的经贸和投资项目。而且中国近年来正加快粮食进口结构多元化，特别是增加从俄、乌进口粮食作物和化肥等农资以改善本国的粮食安全结构，俄乌冲突爆发及其衍生影响对粮食、化肥等供应链的冲击，叠加近年来极端气候对国内粮食生产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粮食安全的风险敞口。

另一方面，俄乌冲突不仅加快了中美两国在科技和关键产业链的脱钩趋势，而且对中美金融领域的合作关系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北京尤其关注美国实施的两个步骤。其一是参院近期通过《美国竞争法案》修订版，标志着美国立法部门推动对华科技和关键产业链脱钩进入快车道。其二是拜登总统于5月23日宣布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标志着美国加快构建“去中国的关键供应链”同盟。对北京而言，俄乌冲突不仅让北京要进一步面对中美科技和关键产业链脱钩的压力，美西方对俄发动史无前例的金融战，包括冻结俄罗斯在美西方国家超过3000亿美元的外汇资产，也使得北京日益意识到全面防范和反制美国对中国实施“金融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何全面提高中国对美斗争中“金融武器”的防御能力和进攻能力已经成为中国政府需要大力谋划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也预示着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的“脱钩”趋势正从科技和关键产业链等实体经济加速向着以金融、银行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蔓延。

第三，台海紧张升级的警报器被不断拉响。一方面，早在俄乌冲突升级前，拜登政府继承了其前任“以台制华”的战略，即华盛顿在对华长期竞争战略框架下，大幅提升台湾在美全球和地区战略中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地位，美国政府“一个中国政策”被不断掏空。对北京而言，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两项重要倒退引起中方高度警惕和不满。其一是拜登基本继承了前任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的重大调整，明确把“与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并列，作为处理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的法理和政治基础，大幅提升美台关系的政治和战略意义。其二是拜登政府继续有意混淆美国“一个中国政策”下对大陆和台湾的定位，以及美频繁威胁施压欲与北京建交的“台湾邦交国”等行为，都被北京认为是支持台湾民进党政府实际推行的

“一中一台”政策的严重挑衅举动。在中方看来，美国日益空心化的“一个中国政策”同中方强调的“一个中国原则”已经没有太多政策交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石已被严重侵蚀。美国政府不仅日益虚化其“一个中国政策”，而且正通过加紧美台政治、军事和经济合作来阻遏大陆统一台湾的步伐，和平统一时间是否仍掌握在中方手里成为中国国内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北京对美台关系的这种认知势必影响中国政府和民众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走向。

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后美国政府的台海政策有加速“战略清晰”之势，加剧了中美之间有效管理台湾问题的难度。尽管近年来美国国内围绕是否要放弃台海政策上的“战略模糊”时有争论，但总体局限在智库专家圈内，美国政府对于一旦台海有事，美国是否必然军事介入仍然表态谨慎。但是俄乌冲突后，不仅华盛顿的智库专家密集高调讨论所谓“俄乌冲突对台海影响”，美国政府和国会也纷纷对所谓北京可能武力攻台的前景及后果发出警告。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称中国大陆将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事中汲取经验，为未来“入侵”台湾做准备，并重申了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则威胁说，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美国将对北京施加类似对俄罗斯的制裁。在美方看来，美西方团结全方位制裁孤立俄罗斯，援助乌克兰开展对俄“持久战”不仅能够削弱俄罗斯，而且增加了对北京所谓“武统台湾”的威慑效应。期间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拜登在5月23日访问日本时公开宣称一旦台海起战火，美军将协防台湾。尽管白宫及拜登本人事后表示美对台政策没有变化，但北京对拜登政府包括其本人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信任度也降到新低。与此同时，华盛顿的众多智库专家也毫不掩饰地鼓励台湾应该多从乌克兰“非对称”、“灵活”的对俄军事战略中学习在冲突场景下对抗大陆的经验。此外，华盛顿还通过在亚太强化军事同盟的方式，鼓励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友在台问题上向北京施压。从中方角度看，华盛顿故意将一个主权国家乌克兰同一个没有主权的台湾相提并论，暴露了其所谓“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虚伪，是为日后干涉中国统一进程做法理准备。俄乌冲突后，美国政府对台海问题最新的政策宣示或对华威胁，都进一步证明了美“以台制华”力度正不断升级，其不惜武力阻止两岸统一的政策走向进一步清晰。随着北京对华盛顿在涉台问题上不满和不信任与日俱增，加之双方目前对话交流的机制运行不畅，未来围绕台海问题不确定性和危机风险将持续上升，势必严重冲击中美关系乃至全球和平稳定。

两大启示

无论是对国际安全秩序、大国关系格局还是世界经济发展而言，俄罗斯同美西方围绕乌克兰的军事冲突是冷战结束三十年来的又一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混乱的年代催人深思。对于中美关系而言，俄乌冲突背后的教训和启示是多方面的，其中两方面尤为重要。

一是，必须审慎管理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一般而言，除非结盟，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属于常态，无法根除，只能管理。众多的历史案例研究表明，有效缓解大国安全困境的途径首先需要大国之间经常性的战略沟通、建立信任措施，防止彼此刻板印象固化各自对对手的动态认知，从而不断增强相互之间对对方战略意图的准确把握。其次，大国之间要对彼此的核心安全利益保持高度的敏感性，防止不断在对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切香肠”而导致安全困境的继续升级甚而失控。安全困境理论还强调要管理好本国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对安全困境的刺激作用，尤其要防止为了缓解国内压力及转嫁国内各种困境，通过炒作“外敌”从而加剧大国之间战略敌意和对立。

这些理论上的总结，都是源于历史上反复上演的大国安全困境演化乃至恶化的悲剧。二战结束后美苏冷战的爆发与美苏之间安全困境的管理失败密切相关。比如，由于安全文化差异和历史经验等原因，二战后的美苏相互之间都难以理解对方安全政策的复杂原因，双方采取的所谓防御性的安全行动不断引发对方的焦虑和升级反应。在此安全困境不断加剧过程中，又被两个因素进一步放大。一是对对方战略意图判断用意识形态甚至种族特性等所谓“结构性因素”进行归因，比如凯南的长电报就是当时美国对苏联认识的典型代表。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两国国内政治进一步恶化了相互的安全困境。美国政治制度特性、权力制衡和利益集团的作用，使得美国领导人不断夸大来自海外的危险，并借以提升他们在国内的权力。类似的，苏联对美国行为的意识形态化解读和苏联高层对东欧地区强烈的控制欲望，使得美苏之间固有的安全困境不断升级成为一系列的安全对抗事件，导致冷战全面爆发。

如今俄乌之间的冲突终于爆发为兵戎相见，对欧洲地区安全和国际秩序稳定带来严重冲击，其背后固然有复杂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的安全利益纠葛，但同时也揭示出俄罗斯同支持乌克兰现政府的美国及北约之间长期的安全困境管理的失败。包括凯南、基辛格、盖茨等美国众多战略家和前高官也都承认冷战后北约背弃承诺、不断东扩严重刺激了俄罗斯的敌意。美西方对俄罗斯长期奉行的“零和博弈思维”、根深蒂固的

“刻板的敌人意向”、服务国内政治议程的需要，最终导致美西方同俄罗斯安全困境急剧升级并引发灾难性后果。同样，中美双方也应该从历史和现实悲剧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共同管理好两国之间日益严峻的安全困境。

二是，必须尽力防止大国之间的新型混合战争的失控。俄乌冲突不仅已经演变成一场美西方同俄进行的“代理人战争”，更是一场集合了军事战、情报战、金融战、认知战、外交战等多条战线同时开战的21世纪新型混合战争。新型混合战争相对于传统的军事冲突既有不少相似之处，包括大量军人和平民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但最大的不同是战争升级（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的升级）的不可测风险进一步上升。这种不可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新型混合战争的经济影响会迅速超出传统战争的地理范围，形成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根据联合国机构的研究，俄乌军事冲突特别是美西方对俄实施超大规模经济战，使得严峻的能源、粮食短缺和沉重的债务危机迅速冲击广大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使其面临疫后复苏艰难和俄乌冲突的双重打击。不同于传统的军事冲突，大国之间新型混合战争对世界经济危害的风险急剧上升。

其次是金融“武器化”及其滥用增加了传统军事冲突升级的风险。尽管美西方政府津津乐道对俄罗斯的超级经济制裁正严重侵蚀俄罗斯的经济运行，但由于超大规模的金融制裁和经济封锁对俄罗斯经济社会的破坏和对俄罗斯民众的伤害往往没有像战火直接造成血淋淋的人员伤亡和城市摧毁，所以施加者往往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从而导致金融武器滥用和长期化趋势。对于受害者而言，是否只是以牙还牙地用经济手段反制对手，还是全面升级军事冲突本身来对抗金融战和经济战？如果战争一方认为对手的金融战已经造成本国核心安全利益的不可逆的破坏，就可能显著增加其大规模升级战争来迫使对手后退的动机。

再次，核战争阴影再次笼罩欧洲上空。不要忘记，俄乌冲突背后仍是世界两大核武力量的较量。随着拜登政府发出了通过俄乌战争“永久削弱俄罗斯”的明确信号，美国显著提升了乌克兰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位置。这是否会强化普京政府的一个固有观念，即俄同美西方在乌克兰的较量是俄罗斯的“生死存亡”之役？俄罗斯方面也再次发出了信号，如果北约和美西方对乌战事的介入和对乌支持造成了俄无法承受的战略代价，俄罗斯将毫不犹豫地用致命武器予以反击，这也意味着整个北约都将面对又一次的“古巴导弹危机”，及其所引发的“核大战”危险。



2500年前，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无论战争形态发生多少变化，我们仍然要清醒认识其关乎国家和民众生死存亡的根本影响。对于中美两国决策者而言，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管理中美竞争关系，防止失控甚至陷入对抗和军事冲突，是必须谨记于心的国之大事，不可不察。尤其对于当前美国国内那些津津乐道新型混合战争效果的人士，更应当认真从俄乌冲突中汲取教训。

中欧能否共克时艰增进合作？

——俄乌冲突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及应对

崔洪建

作为发生在欧洲地区但具有全球影响的地缘政治对抗，俄乌冲突对中欧关系产生重要且复杂影响。首先，由于对俄乌冲突性质的认识及利益关联不同，中欧之间存在立场差异，相互期待出现较大落差，政治互信面临考验；其次，俄乌冲突以及欧美与俄罗斯之间的制裁与反制裁斗争，暴露出当前国际经济、能源和供应链体系的脆弱性，对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不断造成损害，对中欧关系的经济基础及合作路径形成冲击；最后，美、俄、欧等主要力量均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卷入冲突，大国关系出现高度复杂的互动格局，加剧了国际秩序转型期的不稳定性，中欧关系承受更大的战略压力。尽管俄乌冲突成为影响中欧关系的不确定因素，但早日以和平方式化解冲突、避免人道主义危机、减少经济民生损失和维护国际格局稳定，符合包括中欧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应当成为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

中欧政治互信面临考验

毋庸讳言，中欧之间在对俄乌冲突起因及性质的认识上存在较大分歧，由此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在欧洲看来，俄罗斯寻求“势力范围”的大国（帝国）意识与中小国家寻求“集体安全保护”的倾向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成为俄乌冲突的主要根源。多数欧洲国家据此强调北约的“防御性质”，不接受俄方有关“有权对北约扩张挤压安全空间进行还击”的说法，因此认定冲突的性质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入侵”。中方对俄乌冲突起因和性质的判断则主要基于地区安全架构的视角，认为冲突的实质是美国利用北约和乌克兰作为对抗俄罗斯的工具并招致俄方强烈反弹，其实质是大国竞争对抗在地区安全层面造成的严重后果。因此中方主张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安全关切同样重要并应受到同等尊重和对待，期待欧洲国家发挥地区安全主体的作用，不仅要

着手于采取有助于停火止战的措施，更要着眼于建立均衡、有效和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来避免冲突再起，实现长治久安。

俄乌冲突发生在欧洲的“家门口”而中国并非直接当事方，双方在对冲突的认识及立场上存在分歧本无可厚非。但欧洲受制于先入为主的观念和美国意图裹挟的影响，对中方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强人所难的要求，包括要求中方公开谴责俄罗斯并参与欧美对俄制裁，进而提出将中方立场与中欧关系进行“挂钩”。在立场差距较大的背景下，近期举行的中欧领导人会晤中出现了双方预期不同频、关切不同步的情况，尽管双方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沟通机会，但对俄乌冲突的不同认识和立场成为影响中欧推进双边合作的新障碍，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欧之间出现的政治互信下降问题未得到明显改善。

中欧经贸合作受到冲击

俄乌冲突成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对世界秩序和国际规则的冲击还在持续发酵，后果和损失难以估量。但在持续两个月后，冲突以及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制裁与反制裁交锋已经严重影响到世界经济、贸易和能源稳定。据国际机构预测，2022年欧盟经济增速预期将下降超过2%，中国经济所受冲击也集中反映在股市震荡、资产缩水和增长预期下降等方面。

中欧经贸合作受到的影响更为复杂。一方面欧洲曾威胁，如果中方“对俄提供军事支持或帮助俄规避制裁”，将对华采取贸易手段“予以惩罚”；另一方面基于其对“中俄绑定”的过度联想，欧洲舆论重新炒作自疫情发生以来就此起彼伏、要“摆脱对中国市场过度依赖以维护供应链安全”的观点，来满足欧洲部分保守势力要通过“摆脱对俄能源、对华经济依赖”来实现狭隘的“战略自主”思想。中欧经贸领域的政治化、安全化趋势进一步增强，中欧关系的经贸基础、相互依存共同利益和务实合作的政策路径受到冲击。

中欧战略互信承受压力

美、俄、欧等主要力量均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卷入俄乌冲突，大国间互动高度复杂，出现新一轮分化组合的迹象。从目前形势来看，中美竞争格局未变，中俄伙伴关系稳固，美俄对抗加剧，欧俄走向对立，美欧协调加强，而中欧关系成为这几对大国关系变化的主要承压方，历来以共同坚持多边主义、主张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为共识的中欧战略互信受到集团对抗和强权政治的冲击，中欧关系的运筹空间受限且变数增大。

美国出于自身战略目标正利用俄乌冲突来调动欧洲，不仅要统一对俄立场，还通过渲染“中俄结盟”与欧洲加强对华政策协调。美国在“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名义下，利用美欧“中国对话”、“印太战略”对话等双边机制以及北约框架，不仅要求统一思想还要协调行动。通过炒作“中俄一体”并将乌克兰与台湾做类比，美国不仅刻意“帮助”欧洲加大和中国在观念和制度上的对立，还鼓动欧洲“积极”介入亚太事务，在中国周边为其对华战略提供支持和配合。美国的挑唆和欧洲内部的一些声音形成同频共振，正在将对俄罗斯的恐惧和敌意转移到中国身上。中国根据自身对冲突性质的认识和对大国关系的判断来决定立场，不会屈从于美国的压力，也难以在欧俄之间左右摇摆，中欧关系承受的战略压力持续上升。

中欧可以有所作为

在俄乌冲突对中欧关系产生的上述影响和压力下，中欧关系并非不能有所作为。

首先，中欧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尽管有差异但也有交集。中方对欧洲承受的代价和损失感同身受、深为痛惜。不仅欧洲的“家门口”重燃战火，还可能升级并蔓延至其他欧洲国家，冷战结束以来的欧洲和平状态被终结。中国在历史上曾饱受战火蹂躏，当前也面临强权政治带来的巨大安全风险，因此，尽快停火止战并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冲突、尽早建立互信并通过政治手段化解矛盾、尽量达成和解并通过重塑安全架构来实现持久和平，应当成为中欧共同的努力方向和合作目标。中欧领导人已就俄乌冲突进行多次通话，成为国际社会劝和促谈努力中的重要组成。

其次，中欧都致力于避免和减少冲突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在冲突持续百日有余，目前已造成大量乌克兰平民伤亡并有超过700万难民背井离乡、逃离他国，给欧洲带来

巨大的经济、财政、政治和社会隐患，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带来巨大的人道主义压力。中方将开展人道主义援助作为与劝和促谈同样重要的优先事项，不仅已向乌克兰方面提供了多批人道主义援助，还向接收难民的周边国家提供资金支持。除在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联合会等框架内加强合作外，中欧还可以将人道主义援助提上双边议事日程并作为优先的合作事项。

第三，中欧都希望减少冲突的溢出效应，尽量避免对各自经济、能源及供应链安全造成过度冲击。中欧互为最大贸易伙伴，投资、产业及供应链合作密切，抵御住了疫情冲击、展现出强大韧性。尽管欧洲参与了对俄罗斯的制裁，但由于欧俄之间密切的经贸联系尤其是巨大的能源相互依赖，不仅制裁效果不彰，欧洲还出现了通货膨胀、能源紧张和资源短缺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制裁对欧俄乃至世界经济造成多输的趋势日益明显。中国从反对单边制裁的一贯立场和维护世界经济稳定的角度出发，希望欧方冷静看待后果并停止滥用制裁手段，双方具有维护世界经济复苏、确保能源及供应链安全的共同关切，应当就此展开务实合作。

最后，俄乌冲突的影响正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极大地削弱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规则和治理体系，拥有多边主义共识的中欧将深受其害，双方应当倾尽全力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亚太、欧洲得以实现和平繁荣的国际环境。俄乌冲突对国际社会造成严重割裂，大国互信赤字上升、地缘政治矛盾层出不穷。作为有志于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中欧关系应当超越经贸合作，在增进战略互信的基础上培育出在国际危机管控和全球治理改良领域新的合作点。如果中欧能够从不同立场出发但能明确共同利益并合作共事，眼下的俄乌冲突和未来的和平重建可以成为中欧实现合作增值的重要起点。

俄乌冲突不会改变中俄关系发展的 内在逻辑和独立价值

赵隆

近年来，中俄关系已成为互信程度最高、协作水平最高、战略价值最高的大国关系典范。俄乌冲突爆发后，如何看待中俄关系发展外部环境受到的冲击，如何理解冲突对中俄关系内在逻辑的重塑能力，以及中俄关系未来发展的前景，成为判断俄乌冲突对大国博弈态势影响的重要参考。

中俄关系的外部环境面临冲击

第一，维护国际体系和秩序的共识承受“压力测试”。在俄乌冲突背景下，虽然国际体系尚未处于彻底崩塌的绝境，但其整体脆弱性和局部分化趋势不可避免。不论是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将俄逐出世界贸易组织（WTO）、二十国集团（G20）的讨论，还是愈演愈烈的“民主—威权”二元对立叙事^①和“中俄轴心”^②的塑造都表明，国际力量可能出现以排他性安全、价值观对立为标志的“阵营化”重组。在此背景下，俄全球议程设置权和多边事务参与权可能受到挤压，中俄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共识，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和制度性成本。

第二，深化务实合作的机遇和风险同步上升。在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叠加影响下，普惠型全球化的红利料将逐渐消亡。金融武器化、技术武器化和能源武器化的趋势，以及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的安全化重构难以逆转。各国建立贸易“防火墙”和产业“隔离带”的需求将急剧上升。在机遇方面，中俄关系将成为俄罗

^① Anne Applebaum, “There is No Liberal World Order, Unless Democracies Defend Themselves, the Forces of Autocracy will Destroy Them,” *The Atlantic*, March 31, 2022,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2/05/autocracy-could-destroy-democracy-russia-ukraine/629363/>.

^② Angela Stent, “Russia and China: Axis of Revisionists?” Brookings, February 2020,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russia-and-china-axis-of-revisionists/>.

斯摆脱政治孤立、经济困境、技术封锁的核心抓手，在能源、科技、投资、金融等领域的对华需求将更为强劲，中国的市场、资金、技术、人才可能填补美欧与俄罗斯“脱钩”造成的真空。但与此同时，俄乌冲突持久化给予美、欧、日等国不断加码制裁的空间，俄罗斯的经济预期、金融市场、投资环境受到严重冲击。无论是动用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等“核武级”的金融制裁，还是俄罗斯推动的“俄概股退市”或以“天然气卢布”瓦解“石油美元”霸权的尝试，都将增加中俄深化务实合作的外部风险。中资企业或个人开展对俄合作面临“次级制裁”风险，包括被列入美国的《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SDN）清单；在俄海外工程承包、跨境投资和贸易结算面临障碍；过境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中欧班列”可能被迫缩减；对俄能源和高科技合作面临“长臂管辖”。

第三，战略定位和外交重心亟待协调。对俄罗斯而言，俄乌冲突导致俄罗斯和欧盟之间将形成深刻的思想和伦理“分水岭”^③。随着欧盟提出在 2030 年前摆脱对俄化石能源的依赖，能源合作对俄欧关系的杠杆效用面临终结。美国利用俄乌冲突对俄进行“孤岛化”改造的冲动，也将限制双方有限妥协的意愿和空间。俄战略取向可能从“文明归属”的争论转向独立存在的“文明例外”共识，非西方世界和“向东看”将成为其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④相较于俄罗斯的“外交转向”，中国外交仍坚持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在全方位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同时，强调根据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认为中欧作为全球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和深厚合作基础。在未来的中俄美欧大国博弈中，俄罗斯的主动地位和运筹能力将发生变化，中俄面临战略定位和外交重心上的再协调。

^③ Фё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ЕС прокладывается серьёзный водораздел, 04.04.2022,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https://globalaffairs.ru/articles/mezhdu-rossiej-i-es-vodorazdel/>

^④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Кто мы, где мы, за что мы – и почему, 11.04.2022,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https://globalaffairs.ru/articles/kto-my-gde-my/>

超越冷战思维和经验主义：

理性看待冲突对中俄关系内在逻辑的重塑能力

第一，中俄不会借机结盟或打造“反西方”的统一战线。不少专家认为，面对所谓的“集体西方”的战略压力和美国的“双遏制”策略，特别是俄罗斯因俄乌冲突受到前所未有的制裁与孤立下，中俄将被迫走上讨论已久的结盟路径，加强战略和利益捆绑，打造所谓的“反西方”统一战线。实际上，中俄结盟违背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也不符合双方对彼此的定位。从历史经验看，中国在近代与俄罗斯（苏联）曾经进行过三次结盟的尝试，包括清政府与沙皇俄国于 1896 年签订的《中俄密约》；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于 1945 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苏联政府于 1950 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结果表明，三次结盟尝试都未能实现共同防御，未能构建中俄的平等互利关系，未能化解意识形态或国家利益分歧，甚至一度兵戎相见，最终成为两国关系发展史的“失败案例”。正是基于上述教训，中俄通过签署《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等系列历史性政治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理念，经过历史和现实验证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中俄关系“黄金标准”，不会因俄乌冲突造成的政治和安全乱象而改变。

此外，中俄（特别是中国）与“集体西方”在经贸、科技、人文等方面高度相互依存。2021 年，东盟、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是中国的前五大贸易伙伴，其中欧美日韩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38%^⑤；欧盟是俄罗斯头号贸易伙伴，占俄对外贸易总额的 37%。^⑥虽然俄欧贸易可能因减少能源依赖等措施逐步缩水，但这一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虽然部分国家推动“技术民族主义”，但世界在科学规范、技术标准层面尚未分裂为两个互不兼容的体系。因此，中俄不存在构建“反西方”统一战线的客观物质基础。即使在主观意愿层面，中俄看似在“反西方”共识下不断走近，源自于应对美国的全方位战略挤压和不断强化的“民主—威权”意识形态对抗，是应对霸凌行为和单边制裁的“防御性联动”，而不是以“反西方”为目标构筑进攻性的统一战线。

^⑤ “SCIO Briefing on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of 2021,” January 14, 2022, http://english.scio.gov.cn/pressroom/node_8027777.htm.

^⑥ “EU Trade Relations with Russia. Facts, Figures and Latest Developments,” https://policy.trade.ec.europa.eu/eu-trade-relationships-country-and-region/countries-and-regions/russia_en.

第二，冲突不会导致中俄产生互信赤字，“制裁威胁”难以阻止战略协作深化。俄乌冲突爆发后，有关中俄关系“上不封顶”将受到重大考验，中国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面临“两难选择”，中俄军事协作可能深化等论调不绝于耳，部分国家甚至以制裁威胁中国放弃对俄合作。需要看到的是，中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并未根据西方逻辑简单进行“选边站”，而是根据事件的是非曲直和国家利益独立作出判断，在支持俄合理安全关切的同时，强调尊重和保障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切实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这表明，中俄在部分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实现诉求的方式选择也有所差异，但这无碍中俄战略协作的大局。因为中俄互信建立在双方对国际公平正义的共同认知，对世界大势的共同判断，以及对各自国家利益的相互协调之上，可以保持高度的内部韧性和对外灵活性。同时，由于不遵循“非敌既友”式的同盟逻辑，亦或“我者他者”的身份认同逻辑，中俄战略协作不会因立场差异而产生隔阂，也不会因为外界的离间利诱而分化。与此同时，在中美俄三方互动中，双边关系的平行发展态势不会被打破，中俄关系与中美关系、美俄关系之间不存在对立或联动性^⑦，无论是从“冷战大三角”的逻辑尝试策动“联俄抗中”，还是威胁施压中国在中俄和中国与西方关系中进行“命运的选择”，都不具备可行性。

第三，中俄关系的内生动力和独立价值将更为凸显。中俄两国互为各自的最大邻国，拥有长达 4300 公里的边界线；中俄同为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经贸结构高度互补，双边贸易额从 2000 年的 80 亿美元提升到 2021 年的 1468 亿美元^⑧，从单纯贸易拓展到联合研发、联合生产、发展战略对接等全新高度，跨境电商、数字经济、农业、旅游业、服务贸易日益成为与传统战略性大项目并驾齐驱的新动能和新增长点；中俄同为地区与多边合作的关键力量，引领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机制发展。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中俄关系具有强大内生动力和独立价值，不受国际风云变幻影响，不受任何其他因素干扰。”^⑨中俄作为最大邻国共享的地缘环境、肩负的国际责任、具备的比较优势和发展互补性，是双边关系快速发展的内生驱动力，这些“恒定

^⑦ “Ambassador Qin Gang Publishes an Article Entitled ‘The Ukraine Crisis and Its Aftermath’ on The National Interest,” April 18, 2022, http://www.china-embassy.org/eng/dshd/202204/t20220418_10669278.htm.

^⑧ “China-Russia Trade Hits Record High in 2021 amid Stronger Energy Cooperation: Russian Envoy,” *Global Times*, January 25, 2022,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201/1246911.shtml>.

^⑨ “Xi Eyes Unwavering Development of China-Russia Partnership,” Xinhuanet, December 29, 2020,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0-12/29/c_139624811.htm.

因素”不会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中俄无意且没有条件结盟，中国也没有义务切割与俄罗斯正常的经贸关系。此外，中俄强化全方位战略协作的落脚点并非基于实力地位的“权力扩张”，而是履行维护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大国责任。加强双边战略协作不针对第三国，也不受第三国和国际形势变幻影响。由于不存在传统同盟政治中的责任约束、利益交换和“主从关系”，中俄战略协作无需利用俄乌冲突而捏造“假想敌”或划定“势力范围”，无需超越各自的战略意志和能力边界，更不会超越合理诉求和发展需要。

“建设性协同”：中俄关系发展的愿景

可以肯定，因俄乌冲突溢出效应引发的全球力量的分化与组合，秩序的裂变与重构，思潮的碰撞与融合，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动荡与变革将持续发酵。如何应对“后冲突”时代的国家体系、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中的新挑战，将成为中俄关系发展需要面对的优先任务。

首先，强化在全球和多边层面的建设性协同，成为动荡变局中的“稳压器”。中俄战略协作虽为双边关系，却具有全球性意义，直接关乎地区与世界的稳定。针对俄乌冲突可能造成的重返“雅尔塔”（势力范围划分）或回归“维也纳”（大国协调与均势）的秩序辩论，面对世界可能从发展议程主导下的“南北互动”重回安全议程主导下的“东西之争”，以及各国有关安全观、秩序观、价值观的认知鸿沟与冲突，中俄需要在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平稳运行，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完善全球治理方面形成“建设性协同”，防止任何力量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进行“破坏性重构”，避免世界滑入“新冷战”。

其次，坚持中俄双边互信的“上不封顶”，但同时明确底线。在俄乌冲突爆发前，中国通过联合声明的形式呼应俄罗斯有关“反对北约东扩”的立场，还提出“理解并支持俄方提出的构建有法律约束力的欧洲长期安全保障的相关建议”，其原因并非中俄互信的“不封顶”驱使，而是基于中国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也就是一国安全不应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地区安全不能以加强和扩大军事集团保障的既有立场。此外，面对美国强化五眼联盟、兜售“四边机制”（Quad）、拼凑“三

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尝试打造“印太版小北约”的战略冲动, 中国首次明确“反对北约东扩”也是基于全球和周边安全态势变化主动作出的政策宣誓, 并非依附于俄罗斯安全诉求的“立场绑定”。应该说, 中俄互信“上不封顶”的底线, 就是做到各自诉求与双方共识的平衡, 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平衡, “守望相助”与“志同道合”原则的平衡, 确保中俄互信成为捍卫基本的国际准则和国际道义, 维护世界公平正义的“优质资产”。

最后, 倡导中俄战略协作“不设禁区”, 但更加突出价值导向。俄乌冲突的爆发表明, 针对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当中的不公正、不合理、不完善之处, 中俄既有共同认知, 也存在解决方式的选择差异。中国强调在悉心维护的基础上对国际秩序进行改革完善^⑩, 而俄罗斯则强调对其重构或“终结”, 甚至将经典的军事冲突作为扭转政治进程的方式之一。这也说明, 中俄战略协作在领域上不设置“禁区”, 但需要协调双方的理念差异, 将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干涉主义、霸凌行为等共识作为战略协作的核心价值, 并凸显中俄战略协作的普惠共赢效应。

综合来看, 虽然俄乌冲突可能造成中俄既有共识面临“压力测试”, 重新协调战略定位和外交重心, 导致务实合作危机并存, 但不会重塑中俄双边关系发展的内在逻辑, 不会导致“反西方”联盟的出现, 也不会引发中俄互信赤字, 中俄关系的内生动力和独立价值将更为凸显。强化在全球和多边层面的建设性协同, 在坚持互信“上不封顶”的同时明确底线, 倡导协作“不设禁区”的同时更突出价值导向, 是中俄关系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高水平迈进的关键所在。

^⑩ “Xi Meets Foreign Attendees to Imperial Springs Int'l Forum, Calls for Upholding Multilateralism,” Xinhuanet, December 4, 2019, https://english.www.gov.cn/news/topnews/201912/04/content_WS5de6f08ec6d0bcf8c4c1842e.html.

俄乌冲突对国际核军控和裁军的影响*

吴苑思

俄乌冲突再次对管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敲响警钟。国际社会应积极行动，改变一段时间以来在国际核军控和裁军方面的消极、无为状态，充分运用好现有的各种机制和平台，重新激发有利于核军控和裁军的内生动力。中国支持国际核军控和裁军机制，一直奉行非常克制的核政策，在当前核风险上升的情况下，要继续推动国际核军控和裁军走出一条维护持久和平、稳定的新路。

五大核风险

俄乌冲突虽然尚未实际出现使用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况，但这一冲突揭示出的核风险至少有五种情景。

第一，有核武器国家^①使用核武器的风险。虽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使用核武器已被认为是现实中无法想象的事情，2022年1月五个有核武器国家发表了《关于防止核战争和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但在此次俄乌冲突中，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力量进入了特殊战备状态，这使全世界感受到了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核时代以来形成的核武器不应该被使用的观念和文化都需要重新被确认。

第二，无核武器国家境内核设施遭破坏的风险。就此次俄乌冲突来看，乌克兰境内的核电站成为核风险的另一个来源，至少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遭到有核武器国家或无核武器国家的军事打击而发生核泄漏。二是拥有核电站的无核武器国家以核设施为手段实施核威慑。三是在特定条件下，核设施遭到恐怖主义组织等非政府组织破坏。对于以上风险，虽然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机构高度重视，但很难在第

* 本文的完整中文版本见：《国际展望》，2022年第3期。

^① “有核武器国家”是指《核不扩散条约》认可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根据《核不扩散条约》，在1967年1月1日前爆炸核武器或其他核装置的国家被称为“有核武器国家”。

一时间作出反应并提供安全保障。国际社会对民用核设施的管理至少是不充分、不完善的。

第三，更多无核武器国家跨越核门槛的风险。由于在俄乌冲突中面临十分被动的局面，乌克兰公开宣称后悔在1994年放弃其曾经拥有的核武器。此外，乌克兰的处境还使一些无核武器国家再次重新思考其在是否拥核方面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日、韩等国在希望拥核方面的动向提示国际社会，当前重提核武器开发要求的不少国家是美国的盟友。^② 这种情况不同于此前主要是非美集团的国家寻求拥有核武器。从历史上看，美国在核扩散问题上经常对其盟友或意图拉拢的国家网开一面。在当前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频受冲击的情况下，如果美国再次放任其盟友的核扩散行动，将对当前的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造成致命打击。

第四，国际核军控及裁军谈判陷入僵局的风险。在俄乌冲突中，一个尚未受到充分重视的问题是美俄战略稳定对话前途未卜。美俄两国的核武库规模相当，两国的核弹头数量占全球核弹头总数的近90%。^③ 美、俄两国中的任何一国不参与国际核军控和裁军，都将对全球安全产生重大消极影响。如果美俄战略稳定对话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无法恢复，同时美西方继续加大和巩固对俄制裁和排斥，俄罗斯未来在国际核军控和裁军问题上将发挥什么作用、将如何发挥作用，都将值得观察。^④

第五，有核武器国家进一步提升核军备的风险。俄乌冲突到目前为止并未使欧洲安全架构朝着更平衡、更包容的方向发展。相反，美国利用俄乌冲突进一步强化北约，增加在中东欧的军事部署，促使欧洲国家增加军费，进一步论证发展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合理性。^⑤ 显然，美国和北约的这些行为又会进一步刺激俄罗斯进行反制。无

^② 与韩日等盟友发出拥核言论不同，有关伊核问题谈判在俄乌冲突期间仍在进行。虽然伊核问题到目前为止仍未达成协议，但可以发现，伊朗并没有因俄乌冲突改变其在核问题上的立场。

^③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1年1月公布的数字认为，美国有核弹头5550枚，俄罗斯6255枚，两国的核弹头占据了全球核弹头总数的约90%。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数据中，除了美、俄、英、法、中，还包括对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及朝鲜核弹头数量的估算。<https://www.sipri.org/research/armament-and-disarmament/nuclear-disarmament-arms-control-and-non-proliferation/world-nuclear-forces>。

^④ 关于俄乌冲突对俄罗斯在国际核军控和裁军问题上角色的影响，可参见Rose Gottemoeller, “How to Stop a New Nuclear Arms Race,” *Foreign Affairs*, 网站文章, 2022年3月9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russia-fsu/2022-03-09/how-stop-new-nuclear-arms-race>。

^⑤ 2022年3月28日，美国国防部发布《2022年国防战略报告事实清单》。该文件强调，在此次的国防战略报告中首

独有偶，美国在欧洲强化北约及其军事部署的行动，将同样映射到亚太地区。这样，美、俄、中以及其他相关国家在核、导弹防御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互动将成为国际核军控和裁军在下一阶段不得不关注的内容。

核风险管控的主要困难

俄乌冲突迄今为止虽然仍是区域性的，动用的是常规力量，但其对如何防范核风险、能否继续保障核安全提出了问题。其中涉及的问题至少包括：有核武器国家的核政策、国际核军控和裁军机制的有效性、无核武器国家的角色以及有核武器国家间的关系等。

第一，有核武器国家的核政策。核武器诞生70多年来，中国之外的其他有核武器国家仍然以“核威慑”或“延伸威慑”为理由，拒绝采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使世界处于核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的危险中。更为严重的是，冷战时期促使美苏保持战略稳定的一些因素不再适用。在此情况下，管控核风险需要有核武器国家再次确认彼此的战略意图，在政策上做出新的承诺。

第二，国际机制的有效性。冷战结束后，宣布拥核的国家不断增加，而美国在小布什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期间又不断退出重要的国际军控和裁军条约，国际核不扩散和裁军机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受到质疑。俄乌冲突则更加凸显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国际社会需要采取措施重塑国际核军控和裁军机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第三，无核武器国家的角色。俄乌冲突使人们看到了无核武器国家在核风险问题上的另一面。无核武器国家虽然没有核武器，但它们在极端情况下也可以利用境内的民用核设施实施核威慑。而且，无核武器国家境内的民用核设施还可能落入一些危险的非政府组织手中。因此，无核武器国家在管控核风险方面也应该承担更大责任，并就极端情况下管控其境内的民用核设施作出承诺，采取具体行动。

次整合了核态势审议评估和导弹防御审议评估，美国军方进一步提升导弹防御系统在整个国防战略中重要性的意图可见一斑。参见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act Sheet: 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March 28, 2022, <https://media.defense.gov/2022/Mar/28/2002964702/-1/-1/1/NDS-FACT-SHEET.PDF>。

第四，有核武器国家间的关系。当前，大国之间的关系充满挑战。首先，美俄战略稳定谈判显然已经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其次，拜登政府在对外战略中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这与历史上美国启动军控谈判时的情况有明显差距。再次，大国关系重新转向地缘战略博弈。基于此，如何使有核武器国家继续保持冷战结束以来在国际军控和裁军问题上的合作就成为一个问题。

加强核风险管控的路径

俄乌冲突再次凸显国际社会面临诸多核风险。综合这些风险对全球安全和国际核军控和裁军体系造成的冲击及其发生的可能性，本文认为，国际社会应以俄乌冲突中暴露的核风险为契机，以进一步防止核扩散、保障核设施安全以及避免核冲突为目标，重新修复国际核军控和裁军机制的全球核治理。

第一，充分用好《核不扩散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重新确认核不扩散和核军控目标。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核不扩散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一再延后，目前暂定于2022年8月举行，这为国际社会重新激发国际核军控和裁军合作提供了一个机遇。国际社会应立即打开各种渠道积极为拟议中的《核不扩散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设立一个建设性的议程，同时推动有核武器国家为国际核军控和裁军作出更大贡献。

第二，重新推进核安全合作，继续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管控民用核设施风险方面的作用。加强对民用核设施的安全防护至少有两个重要平台，分别是2009—2016年核安全峰会留下的成果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其中，设立在北京房山的中美核安保示范中心是核安全峰会的重要成果之一，可以为亚太地区各国提供系统、全面的核安保教育培训。

第三，敦促核大国继续承担核军控和裁军责任。美国对国际核军控和裁军负有十分特殊的责任。国际社会仍要督促核大国承担其在核军控和裁军方面的责任，使其实质性、更进一步地裁减核武器，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严格管控其盟友谋求核武器的冲动，采取措施改善刺激核风险的国际安全环境。

第四，推动有核武器国家之间重建战略互信。首先，主要核力量之间需要重新确认彼此的战略意图。其次，有核武器国家之间需要认真探讨如何实现战略稳定。在当

今时代，如何实现有核武器国家间的战略稳定也需要更宽广的视野。再次，主要核力量之间还需要就预防事故性发射等危机管控措施进行磋商。

面对国际核军控和裁军面临的诸多问题，中国应继续推动国际核军控和裁军走出一条能够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稳定的新路。

俄乌冲突加快国际经济秩序调整进程

余翔

俄乌冲突的爆发为百年变局添加了新的时代注脚。叠加世纪疫情，俄乌冲突加速了国际经济秩序从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向多边平行体系并存的全球化演进。

冲突表象下的深层矛盾

从经济金融角度观察，俄乌冲突背后反映的深层矛盾和爆发时机值得关注。

首先是能源出口国和能源进口国之间的深层矛盾。俄乌冲突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经纬，表面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之间的冲突，其实是俄罗斯和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在冷战之后的再次正面碰撞。俄罗斯经济长期高度依赖能源出口。欧洲则是俄罗斯主要能源进口国。乌克兰在俄、欧之间扮演着能源进出口的陆上大陆桥的角色，并由此获得不菲的能源过境收入。但乌克兰越来越不满足于只做俄罗斯和欧洲的“能源大陆桥”和“世界粮仓”，而是希望通过与欧洲加强经济金融上的融合，参与西方经济金融大循环，升级自身经济模式。面对乌克兰的“叛逆”，俄罗斯“武器化”对乌能源出口，采取暂停对乌供气、提高对乌能源出口价格等措施，“鞭子”打在乌克兰身上，但实质上更受损的是能源消费终端的西欧国家。由是，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在这个问题上对俄罗斯早已心怀不满。

其次是俄罗斯能源出口型经济模式与西方信息经济模式之间的深层矛盾。近年来西方持续对俄罗斯的经济、技术封锁让其科技在国民经济中的应用速度显著慢于西方。而西方得益于科技的快速迭代，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推动其经济形态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演进。信息经济较能源出口型经济模式的显著优势在于，信息经济将现代信息技术作为重要投入要素，单位产出能耗降低，对能源的总需求减少。而作为能源生产型经济则自然希望他国能扩大能源消费。又者，能源出口收入易受国际价格波动影响。新冠疫情爆发前，国际能源价格的持续低迷，加重俄罗斯经济困难。两种模式长

期发展的结果便是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失衡的加重，俄罗斯能源出口型经济模式与西方信息经济模式之间矛盾的不断加深。

此外，还需要关注的是此次俄乌冲突爆发的时点是美国经济新周期的开启，股市和经济基本面出现显著偏离，美联储为退出经济刺激政策而头疼不已的特殊时期。俄乌冲突的爆发为拜登政府转移国内矛盾，加快国内军工生产提供了有利契机。上述事件在时间上同时发展，这到底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是具有关联性，值得深入研究。

短期影响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俄乌冲突不符合中国利益。中国是现行国际经济体系和秩序的受益者，对其不合理之处，中国的立场是清晰和一贯的，即中国希望在联合国框架下，坚持多边主义，对现行国际经济体系做增量式改革。从经济角度来说，成本最小的变革方式是从一种稳定状态逐步过渡到另一种稳定状态，而非跃迁。用中国的话说就是“先立后破”，而非“先破后立”。因此，对中国而言，保持现有体系稳定，并做增量式国际经济体系改革，最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不是俄乌冲突的直接参与方，但俄乌冲突引发的冲击波对中国产生了负面影响。所谓的中国从冲突中获益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一是俄乌冲突给中国经济金融带来短期冲击。从2021年12月末，中国政府对经济形势的研判和下一步工作要求可以看出，未来中国稳增长、保民生、控物价的压力进一步上升。而俄乌冲突引发的国际经济金融动荡让中国“六稳”“六保”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短期内，由俄乌冲突引发的国际能源价格暴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对中国金融市场投资者情绪产生负面影响。另外，俄乌冲突威胁全球农产品供应，全球粮食价格将进一步飙升，推高早已触及多年高点的大宗商品市场。中国央行货币政策正面临更加严峻考验，需要在保增长的同时，有效防控通胀。在国际方面，俄乌危机可能引发全球粮食的供需失衡。一些产粮大国的“惜售”和富裕国家的“抢购”或给贫穷和缺粮地区带来更大压力。

二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之间展开的制裁与反制裁“斗法”，一波接一波的金融与贸易制裁相继加码，其影响不仅局限于俄、美、欧等直接相关方，亦扩散到国际经济领域。

虽然西方国家宣称制裁举措会对俄罗斯经济和政要产生巨大负面冲击，但事实上，制裁的实际效力可能并非如宣传一般大。亦或是，制裁的效力还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完全表现出来。^①

第一，制裁是把双刃剑，美国等西方国家自身也受到制裁反噬。对俄制裁的同时，西方国家的经济也在“失血”。制裁力度越大，短期内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反向冲击越大。第二，俄罗斯仍有相应政策工具对冲西方制裁。第三，西方制裁让俄罗斯成为新的价值“洼地”，吸引高风险资本流入。一些西方公司意图通过抄底俄罗斯股市和公司资产，获得超额回报。事实上，3月初以来，已有多家西方公司逆势入市，购买俄罗斯廉价的公司债券^②。

然而，即便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效率低于宣传效果，其所产生的负外溢性却显著增大了中国企业的经营风险，这是中国不愿看到的。中国正积极扩大与东欧、中亚贸易，而俄乌冲突的爆发增大了中国在上述国家的投资、贸易风险。中国义乌对乌克兰小商品出口量较平日下降八成。更有对冲基金甚至抓住俄乌冲突之机，在镍等期货市场兴风作浪，中国企业面临的国际经济金融风险大幅上升。^③由于俄罗斯被排除出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系统，其金融机构对通过中国银行业进行跨境资金交易的意愿上升，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禁令让中资金融机构由于担心次级制裁无法接单涉俄罗斯业务。^④中国“一带一路”在欧洲段线路由于冲突而不得不暂停和更改。过境/直达乌克兰的中欧班列被迫做出调整。

此外，中国企业正面临不断增多且类别繁杂的西方制裁禁令，企业误碰制裁禁令的风险在增大，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严重干扰。^⑤

^①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2/03/russia-gas-oil-exports-sanctions/>

^②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3-03/wall-street-is-already-pouncing-on-russia-s-cheap-corporate-debt>

^③ <https://www.economist.com/finance-and-economics/2022/03/19/a-nickel-trading-fiasco-raises-three-big-questions>

^④ <https://fortune.com/2022/03/04/russia-china-ukraine-sanctions-swift-alternative/>

^⑤ <https://www.wsj.com/livecoverage/russia-ukraine-latest-news-2022-03-25/card/yellen-says-sanctions-on-china-for-position-on-russia-s-war-in-ukraine-unnecessary-for-now-gRKq4wJtQ8i2Z7HrVXpP>

长期影响

俄乌冲突的长期影响将远超二战以来的历次局部战争，并将引发世界各国之间新的分化组合，加速世界变局的演进过程。

一是加快国际平行市场的形成。国际经济关系此前已经受到“美国优先”政策的冲击。俄乌冲突将加速国际体系的集团化。虽然从军事冲突角度看，俄乌冲突是一场地区冲突，但从非军事角度看，俄乌冲突已经涉及多国，俨然比拟一场世界大战。战争形式包括金融战、贸易战、高科技战，经济战，政治战，舆论战，意识形态战和文化战等等。规模之大，手段之多，范围之广，均为二战以来之最。美欧等大规模制裁迫使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当多的国家开始认真研究应对西方制裁的方法。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将俄罗斯排除 SWIFT 体系，此举警示很多国家需要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国际支付结算体系，以保护自身利益。因此，未来将会以此划线，形成平行体系，支持俄罗斯的一方形成一个“同盟市场”，而支持乌克兰的会形成另一个“同盟市场”。

但这种平行体系不符合中国的发展利益。中国主张继续推动全球化，对资源进行全球有效配置。集团化和平行市场会增加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成本，不利于人类社会福祉的提高。为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中国应同各国一道，积极致力于冲突后重建议程，推动各国“建大院”“拆高墙”，在绿色发展、气候变化、纾解贫困、隐私保护、化解高债务、打击暴恐等方面加强合作，避免可能出现的集团对抗。

二是加快美元霸权的衰落。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在所谓“美国优先”原则指引下，大打“贸易战”、“关税战”，搞“零和博弈”，严重透支了美国的国际领导力。拜登政府上台后并未调整特朗普时期的经济政策，令美元的国际信用不可逆转地下降。新冠疫情爆发后，美联储实施“无限量化宽松”政策，更让全世界看清了美国利用美元在国际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来转嫁疫情成本的极度自私本质。俄乌冲突后，美欧联手凭借美元霸权，加大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更加重了其他国家的危机感。由此，各国纷纷着手研究美元以外的替代交易、支付系统。^⑥

^⑥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3/08/swift-sanctions-ukraine-russia-nato-putin-war-global-finance/>

对可预见的美元霸权衰落，中国的立场是明确的，即美元体系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中国并不刻意挑战美元霸权地位。中国主张的是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中发挥与中国经济总量相匹配的作用。^⑦

三是国际能源体系加速变革。俄乌冲突让欧洲最终下定决心要走能源多元化道路。这一方面将推动国际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的扁平化、离散化，形象地说，将从“集中式”转变为“分布式”，从“单点式”转变为“矩阵式”。另一方面，或加速新能源革命的到来。太阳能、风能、水电等新能源消费比重将会持续上升。国际能源体系的扁平化和离散化带来的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影响是安全目标发生变化。世界主要大国对传统能源供应通道控制的争夺或将减弱，而转向新型的能源设施。

国际能源体系或将会因俄乌冲突而加速转型。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必须尤其注意，现在留给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时间已经不多。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最新报告《冲击、调适与脆弱度》再次发出警告，世界为适应气候变化做好准备的窗口正在迅速关闭；如果再不付诸行动，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将走上一条不归之路。^⑧中美作为世界大国，面对俄乌冲突带来的挑战，更应加强合作，防止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上凝聚的共识被搁置。中美两国应携手继续推动全球能源气候治理；在IEA、OPEC等国际组织的石油安全保障机制的基础上扩充应急响应机制的功能；利用G20平台促进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在能源治理方面达成共识。

^⑦ <https://www.economist.com/finance-and-economics/2022/04/02/will-dollar-dominance-give-way-to-a-multipolar-system-of-currencies>

^⑧ AR6 Climate Change 2022: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https://www.ipcc.ch/report/sixth-assessment-report-working-group-ii/>

关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成立于 1960 年，是隶属于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高级研究机构和知名智库。我院的主要任务是：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以政策咨询为方向，通过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的全方位研究，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通过与国内外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合作交流，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多年来，我院一直被国内外权威机构评为中国最重要的国际问题和中国外交智库之一。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下设六个研究所和六个研究中心，分别是：全球治理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所、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研究所、台港澳研究所；美洲研究中心、亚太研究中心、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西亚非洲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中心、海洋与极地研究中心。此外，我院还是上海国际战略研究会和上海国际关系学会的机构会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编辑出版的中文刊物《国际展望》双月刊，《上研院报告》（中英双版）和英文刊物《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季刊已经成为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论坛。

关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是清华大学校级研究机构，成立于2018年11月7日，旨在打造国际战略和安全领域的国际化和专业化高端智库。

中心有两大目标：一是就国际秩序、国际关系以及战略与安全等问题开展研究，跟踪形势变化并做出判断，为决策提供参考意见和建议；二是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宣介、阐释和传播中国的理念和政策主张，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提升清华大学在战略与国关界的国际影响力。

研究中心以战略与安全、外交与国际关系等问题为主要研究领域，以全球秩序、国际安全治理、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等重大战略与安全问题作为主要研究方向。研究中心实行管委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大使为中心的创始主任。中心设立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术指导和顾问机构，下设美欧研究项目、全球治理研究项目、欧亚研究项目、“战略青年”研究交流项目以及中国论坛秘书处。

宣发统筹

朱菊华

排版设计

葛介艺

张 珺

联合主编

陈东晓 达 巍

出品人

李 忻

©本报告版权归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和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所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Add: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195弄15号

Tel: 021-54614900

<http://www.siiis.org.cn>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Add: 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30号清华大学明斋

Tel: 010-62771388

<http://ciss.tsinghua.edu.cn>

©本报告版权归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和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所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Add: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195弄15号
Tel: 021-54614900
<http://www.siis.org.cn>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Add: 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30号清华大学明斋
Tel: 010-62771388
<http://ciiss.tsinghua.edu.cn>